东坡知登州故事 ⑨

苏轼：一经一偈护子符

吴忠波

苏轼自常州赴登州任历时三个月，穿越夏秋，漫漫旅途，河山为伴。在即将到达登州前，元丰八年九月二十七日，亡子幹儿冥辰两周年之际，他倾情追怀，抄一卷《心经》。登州任期短暂，十一月二日，苏轼携三子苏过入延洪禅院，虔诚地舍鉴说偈。这一经一偈，为死去的幼子超度，为活着的儿子们祈福。

笔墨与经卷、铜镜与碑石——这是苏轼为人父，第一次如此郑重地将自己的愧疚与祈愿，托物寄情献给儿子们。呜呼！五日登州府，除了为政的担当，亦藏着一位父亲迟来的自省与深情。

一、行路

元丰八年夏，朝廷任命苏轼“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”，阶官正七品。朝奉郎，特许借穿绯色官服，算是朝廷的特恩，可谓苏轼被贬谪后“从天而降”的仕宦体面。

然而，自黄州赴汝州、居常州往登州以来，他的家人随车跟马，辗转奔波。特别是途中小儿夭折，对苏轼打击巨大。对比登州任职给他的那点儿体面，早已被击碎得稀里哗啦，只剩下深深的愧疚、自责。

苏轼膝下四子，苏迈老大，是发妻王弗生的，元丰七年到饶州德兴任县尉。次子苏迨、老三苏过，同为续弦王闰之所出，苏迨十六岁，体弱多病，却已能写诗。苏过聪颖听话，十三岁。最小的苏遁，小名幹儿，是侍妾王朝云的宝儿，元丰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生，元丰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。

那年幹儿降生，苏轼老来得子，自然喜不自禁。可当时在黄州，乌台诗案刚过去三年，自然缺少以往的热闹氛围。幹儿出生三天，按俗洗儿，苏轼写了一首诗：“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（《洗儿戏作》，《苏轼诗集》卷四十八）这诗自古被人吟诵，看似幽默、自嘲、豁达，可“无灾无难”这几个字，真不见得能被众生理解！

滑稽的是，苏轼这半生仕宦，“有灾有难”倒成了标配。难道他不聪明？可他的“聪明”却多惹灾祸。为吸取教训，他只好希望儿子笨一点，不被人注意，平安长大、健康到老。

可是老天爷走神了，他的这些祈求，竟然没被理会。元丰七年（1084）四月，苏轼离黄州赴汝州，顺江而下。六月抵金陵一带，七月二十八日，幹儿途中颠簸，感暑热或闷湿染疾，最终病亡于金陵。朝云哭得几乎昏死过去，苏轼懊悔断肠，他的哭子诗，悲天悯人：“吾年四十九，羁旅失幼子。幼子真吾儿，眉角生已似。……吾老常鲜欢，赖此一笑喜。忽然遭夺去，恶业我累尔。”（《苏轼诗集》卷二十三）最后那句，是说他造的孽，连累了幼子。

转身回望：遭陷“乌台”，被贬黄州，均是他的“聪明”所致。这新账老账，他全往自己头上算，不留情面。一个十个月大的婴儿，他有什么错？凭什么要跟着大人颠沛流离，还要搭上性命？这种愧疚，自那时起就扎下了根，伴着他的赴任路途，撕扯得生疼。如今官复原职，到了登州的任上，这种自责情绪，越来越强烈。

二、抄经

元丰八年九月二十七日，为亡儿祈冥福、写《心经》，他落款没写地名。照《苏轼年谱》推算，应在他赴登州途中，在涟水、海州、怀仁或密州之间。

苏轼跟《心经》不是头一回打交道，黄州雪堂，江夏书生李康年在父母忌日，手篆一卷《心经》，捧来求跋。苏轼提笔写“莫作是念”。待到写经这天，款识则自署：“为亡男幹儿写。”与为人题字、应酬戏墨不同，他把十个月大就亡故的孩子，写进“色即是空”里去。

苏轼心里想：“幹儿若活到今天，该两周岁了。”他仿佛听见孩子喊爹爹，在船舱里跑，或与朝云玩耍，好不开心。打个冷闪，他没说什么，在居舍灯下铺纸、磨墨、执笔。墨浓笔涩，手有点抖，他开抄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别人以此求保佑，他却以空慧松绑执——对活人是安心，对亡儿是回向解脱。二百六十字，一笔一画，楷中带行，端正温厚。末后落款：“元丰八年九月二十七日，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为亡男幹儿写。”

这卷《心经》，纸上全是泪痕。“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”——他念了一辈子，这一次念给谁听？朝云会听吗？当年亡子时她哭得要“与子同去”，苏轼写“母哭不可闻，欲与汝俱亡”，为的是朝云，更是羞愧难当的自己。

有人会问，苏轼为何选冥辰写经，不选忌日祭奠？佛教写经重“生”，为生辰回向，不单吊忌日。七月二十八日既是遁儿忌日，也是“乌台”蒙难日，更是他日后辞世日（建中靖国元年），这一天太拥挤了——御史的锁链、小儿的棺木，前后脚来。若在那忌日提笔，“乌台”的风就会先吹透纸背，挡着心经的开头。

他挑了九月二十七日。黄州秋深里，幹儿落地那天，他笑着写“唯愿孩儿愚且鲁”；如今孩子被江风吹走，他把这笑意重抄成般若。

三、舍鉴

十月十五日，苏轼到登州任。五日后，接诏调任礼部郎中。临行前，他不舍登州这个仙佛福地，想到自己似乎还有事要做。十一月二日，苏轼带着三子苏过，去了延洪禅院。

苏过带着一面乌铜鉴（铜镜），玩偶物件，圆径数寸，光明洞彻。宋人避太祖祖父赵敬讳，称照子、铜鉴，此镜可系腰间，正适合随身携带。

延洪禅院里，院僧文泰正在造释迦佛像。佛像初成，需要装藏、开光，希望得到信众的供养。苏轼看着苏过手里的铜鉴，笑着对过儿说：“此鉴光明洞彻，不如送给文泰师，作佛心鉴。”苏过奉手中所持之物，没有一点犹豫。

然后苏轼说了一首偈：“鉴中面像热时灾，无我无造无受者。心花发明照十方，还度如是常法众。”（《佛心鉴偈》，见《苏轼文集》卷二十二）镜中人面，不过大热天远处的一阵蒸汽，看着像水，其实啥也没有。哪有不变的我，哪有谁在造业、受苦。等心头花开了，光照十方，再回向给一切众生。

一镜，一偈，一碑，这是苏轼的嘱托：他把镜和偈都给了佛，请佛照看好他的孩子们！

苏轼平生乐交僧徒，抄经数十种不止。可他少有像在赴登州、居登州和离登州后这样，连着抄经、舍物、说偈、立碑。这一行，他倾尽心力，为夭亡幼子，在途中写经；为他在世的儿子，于登州立碑。

丧子之痛，望儿之安，让为父的苏轼，唯有在这海边仙地，向佛祈求。东坡一生诗文无数，这个仍忌惮“聪明”的父亲，在登州只用了最老实的办法，来给孩子们消灾、求安。

由此看，在登州赴任、卸任的间隙，苏轼已不是“东坡”先生，也不是“苏知州”。他见缝插针，暂时放下“功业”二字，只剩一个父亲的本能，像护佑小鸡一样，让孩子们平安。

四、遗符

丹崖山临海凭风，蓬莱阁倚峰面海，枕着万顷波涛。苏公祠里，供着苏轼的像；卧碑亭中，刻着《海市》诗与《书吴道子画后》的碑。风从海上来，拂过碑面，也拂过像前香火，人们至今还说着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苏公祠”。

那卷《心经》、那面铜鉴、那首偈、那通碑，如今都不见了，不知散落何处。东坡为幹儿写的《心经》，墨迹早佚。南宋嘉定间，补注苏诗、编《东坡先生年谱》的湖州施宿（字武子），在泰州海陵摹勒《澄清堂帖》，卷十一末段刻东坡《心经》并跋，末署“周祜刊”三字。原石早碎，翻刻虽多，皆赖这南宋拓本。二十一行经文，文末“为亡男幹儿写”俱全。

此经的珍贵之处在于是存世孤本，墨迹没了，石头碎了，南宋拓只剩这一本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。东坡多写行书，小楷《心经》极少。这一卷楷中带行，笔沉意尽，堪称一绝。末了“周祜刊”三字，刻工以刀痕见名。

国家博物馆所出法帖书系（晏晓斐）评此帖：“为精心之作”，“笔法沉缓刚健，结体左收右放，行气谨严恭穆，是他难得一见的小楷精品”。加拿大华人书画家朱绍正，说其“楷中兼行，只道虔诚”。这是东坡传世极罕见的一卷写经，也是他把孩子的名字写进佛经的唯一存形。

延洪禅院在登州何处，今已不可考。宋代登州治所在蓬莱，延洪禅院当在城郊或山中，是一方精神所系。院僧文泰造释迦佛像，足见延洪禅院，规模、财力之雄厚。

苏轼到登州第十七天（十一月二日），便携子入寺，与僧交谈，舍鉴说偈，这是寺院、官府往来之证，其香火不绝，法施之灵，也不愧为禅修与民社的聚合之地。

佛心鉴、偈碑随寺毁去，也不知流落何方。宋代铜镜精品本就稀少，这面供佛之鉴，价值远超材质。宋代铸镜以两浙路湖州镜最盛，行销南方，远及日、朝。假设此镜即为湖州镜，不知苏公舍鉴，是否另有所想所寄：只因“乌台”之痛发生在湖州之任？

延洪禅院偈碑，宋石早佚，拓本无征，今天能见的只剩文集里的二十八字，加一行款“元祐元年三月一日立石”。偈碑书法，因苏轼专为立石而作，笃定精品莫属，石质坚润，选工艺精，字口深峻，当是其碑刻之“镇寺之宝”。

时过境迁。一切都散了，但灵魂不散。登州的延洪禅院，让苏轼在这起伏之地，见证了最后的父爱。好在，佛前的一卷经、一面镜、一首偈、一方石，替他说了近一千年。

延洪禅院的地基上，可能盖起了建筑，或长满了荒草。文泰和尚造的那尊释迦文像，不知是湮没了，还是存于别处殿宇。不管怎样，延洪禅院这一文化遗产，应该考其遗址，寻其碑碣。偈碑虽佚，其文尚在《苏轼文集》中，可依文复刻，重立碑石。如此，则一经一偈，皆归登州。

这些，是苏轼作为一位父亲、知州留给登州的念想，也是登州难得的文化遗产。如今，我们仍能从中读出他对儿子们的心事——无灾无难，平安就好。这八个字，苏轼写给了幹儿，也是写给过儿、迈儿、迨儿，写给千年后的芸芸众生。